



重要言论

各级党组织要着力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持续动力，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引导到改革发展上来，让干净的人有更多干事的机会，让干事的人有更干净的环境，让那些既干净又干事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施展才华、脱颖而出，真正实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互促共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



□ 韩庆祥 陈远章

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当今“如果”已经成真，中国果真走出了一条新路。其提供给中国与世界的“礼物”，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西方文明难以破解当今世界困局

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就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而言，从欧洲发轫的西方文明尤为耀眼。从启蒙时代到现代的300多年，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远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然而，自进入21世纪，西方文明开始备受挑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更是把世界推入乱象丛生的境地。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诸如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加深、军备竞赛和核竞赛升级、战争危险加剧、恐怖事件频发、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意味着影响世界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机制出了问题。其深层根源，是西方文明

的逻辑出了问题。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理论根源。西方中心论奉行“一元论”“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即西方世界是“主”、非西方世界是“客”，西方世界是“我族”、非西方世界是“异类”，西方世界是“先生”、非西方世界是“学生”。它标榜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世界看齐。在这种逻辑中，“客随主便”“我族歧视异类”“先生教训学生”自然是西方认为情理之中的事。西方列强主宰和分割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按照这种逻辑，某些国家强推“普世价值”、借助武力输出“颜色革命”、出兵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些闹剧，都是所谓名正言顺的“正义之举”。而事实上，西方文明蕴含着“对立”“对抗”的基因，世界因此被切割成相互冲突的对立体。如此，国际秩序很难持续下去。

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人性根源。自由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和自由最大化，鼓吹私有制，倡导“市场万能”和“民主神话”，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注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指出：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长期处于机械唯物主义观念掌控之中，它只相信世界是物质的，只看得见有形的物质，只追求物质和物质享受。在西方文明牵引下，人类几乎走上了一条追求物质享受的不归路。值得警醒的是，西方鼓吹的“民主神话”在世界各地正在破灭，“市场万能”的梦想屡被“市场失灵”的现实所击破，流行多时的新自由主义正在夕阳西下，它有添乱之嫌而无治乱之力。世界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局部战乱的升级、世界贫困人口急剧增加，都标志着西方文明已深陷危机。

资本扩张是西方文明的行动旨趣，这是导致世界困局的制度根

源。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资本就像脱缰的野马横行于世，推动资本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升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把世界带入险境。因为资本逐利、扩张和增殖的本性，使资本主义形成了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人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金融霸权、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控制世界的统治方式，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公平性、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续性，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的结构性、累积性、依附性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以转移经济危机为目的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之后又相继爆发海湾战争、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这些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如此来看，作为世界困局之始作俑者，西方文明难解当今世界困局，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终要破产，人类呼唤新理论和新文明。

中国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针对当前我国学术界缺乏学术自信、理论自信且在理论创新上存在的某种“肌无力”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构建“理论中的中国”。

在与西方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致使一些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学术的依赖，“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

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和表述体系，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没有真正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核心理论。我们有让世界知道的“舌尖上的中国”，却没有构建起让世界知道的“理论中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要真正解决挨骂问题，就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理论中的中国”，以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要构建“理论中的中国”，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要构建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但还不发达、不强大的历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种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且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既是针对国内因某些领域和方面公平正义供给不足、治理现代化相对滞后而产生的某种分化问题提出的，更是针对国际霸权主义横行而导致的全球创新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治理滞后以及出现的“三大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的。公平正义供给不足会导致社会创新乏力、利益分化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治理现代化滞后会造成诸多难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从而影响民族复兴；霸权主义横行会导致整个世界创新动力更加不足、贫富差距更加悬殊、全球治理更加滞后。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且会使整个世界陷入困境。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担当的勇气和信心，既勇于破解国内难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勇于担负起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和责任，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理论。

（下转7版）

拥抱历史新方位

□ 本报评论员 辛鸣

深刻洞察、科学判断、敏锐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坚定的选择，在重要历史机遇期做正确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96年来的波澜壮阔顺应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和正在开始了新的转换。

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社会从实现发展走向完善发展。经过60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开始决胜全面小康，低层面、基础性的发展基本完成，可以阶段性地点上一个漂亮的逗号。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改变，但是中国社会不再也不能停留于单打一的经济建设，“中心”要与“全面”并驾齐驱，发展重心从狭义的经济发展拓展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发展，要在继续“实现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完善发展”。实现发展不易，完善发展更难。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甚至可能更复杂、更棘手。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政治社会层面的更高期待，如何化解过去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风险、消化日益凸显的沉没成本、抚平有些失衡的形象表达。但是，大国不是强国。如果走向大国可以是量的积累的话，成为强国必须实现质的突破，要科技强、制度强、文化强。中国社会在未来迈向强国的征程中不可能复制当年走向大国的行为模式，通向大国的旧船票不可能登上强国的客船。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如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如何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有新

战略。

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社会从追随赶超走向创新引领。毋庸讳言，中国社会过去近40年处于一种追随赶超的状态，主要是通过不断改革和不断开放，向国际社会学习，以缩短发展差距，赶上时代步伐。如何在保证中国道路不走样、中国制度不动摇、中国理论不放弃的原则下，适应、顺应既有国际惯例与规则，在既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尽可能多地把对中国有益的经验做法、机制模式拿来为我所用，是中国共产党当年很重要的任务。但是随着历史演进时代变迁，倒不完全是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中心，世界格局需要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一轮新的世界格局重构过程中，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能再缺席也不应该再缺席。发出中国声音、发出中国共产党声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营造更加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生态，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有责任，也有资格。

当然，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续。我们在讲“三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一定还要讲“三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拥抱历史新方位，就是既要立足“没有变”，咬定青山不放松；又要顺应“已经变”，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丰富与发展

□ 曹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责任感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把我们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推进到一个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进、亲自督战，对扶贫开发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涵盖了制度本质、任务定位、制度优势、政策要求等多个方面，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新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的时代背景

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国内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贫困问题的新特征、新变化需要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从国际看，顺应全球减贫发展趋势及全球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需要积极响应，继续为全球减贫事业，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近40年来，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但是，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原因，到2014年，全国还有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个贫困户。更为严峻的是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基础条件差，开发成本高，脱贫难度相当大。脱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把消除贫困作为首要政治责任，把改善民生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十三五”的五年中将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将让全体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科学内涵

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的。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告，中国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并倡议加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战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在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瞄准特困地区、特困群众、特困家庭，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到家庭。要做到“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

精准；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其中，“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思路 and 实现途径。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对象精准是前提和基础，项目、资金、措施、派人精准是手段，成效精准是目标和落脚点。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底数，实行动态调整；通过政策举措，国家出台财政、土地、金融等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打出组合拳，因村因户因人施策；通过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保障扶贫政策和措施落地生根。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

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央和地方已经形成了系统的脱贫攻坚基本方略。

（下转5版）

本期导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访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本报推出“名家访谈”栏目，邀请党史党建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对党史党建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

详见5版

完善香港基本法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机制

详见3版

警惕西方学术话语的战略误导

详见2版